

当代的安藏^①

——彼德·茨默教授访谈录

李锦绣

导语：20 世纪初，以西方为首的“中亚探险”，催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吐鲁番学，而吐鲁番回鹘文献的解读，又促进了突厥学的发展。德国一直是吐鲁番学、突厥学研究的重镇，长时期以来，在该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经过 100 多年的探索、发现与解读，回鹘文献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从分类文献释读到建立科学分析体系、从欧亚视角综合研究回鹘历史文化全貌的新趋势。

彼德·茨默(Peter Zieme)教授，是德国第三代回鹘文献研究专家，是目前国际回鹘文献学领域的泰斗。对茨默教授的采访有助于国内学者深入了解德国突厥学、吐鲁番学发展历程，跟踪国际突厥学、欧亚学最新研究现状，促进我国的回鹘文献学、突厥学、内陆欧亚学研究。

彼德·茨默(Peter Zieme)教授简介：德国人，1942 年生于柏林，1960 年入洪堡大学学习伊朗和突厥学，1965 年为德国科学院东方所研究生，1969 年获洪堡大学博士学位。此后，为东德科学院历史与考古中央研究所研究人员。自 1993 年起为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研究员，2001 年任所长(2007 年退休)。同时，兼任柏林自由大学突厥学研究所讲座教授、巴伐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土耳其突厥语言协会荣誉院士、匈牙利科学院荣誉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陆欧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彼德·茨默教授是国际著名的语言学家和回鹘文献研究专家，已出版关于吐鲁番及附近地区出土文献研究专著 10 余部，用德、英、俄、法、土耳其等文字发表论文 200 余篇，在回鹘文献的整理领域成果卓著。其《突厥语摩尼教文献》、《回鹘文佛教头韵诗》、《吐鲁番敦煌出土的回鹘文佛教头韵文书——兼论古突厥诗歌》、《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回鹘文维摩诘所说经》、《高昌回鹘王国的宗教与社会——中亚出土回鹘佛教文献之跋尾与施主》、《回鹘佛典丛残——茨默论文选集》等著作，均为回鹘语言文化研究的里程碑。

访谈时间：2009 年 12 月 29 日

访谈地点：中央民族大学(茨默时任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

采访人：李锦绣(以下简称李)

被采访人：彼德·茨默(以下简称茨默)

一、求学经历

李：在您的求学生涯中，1960 成为洪堡大学伊朗和突厥学专业的学生，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您为何选择伊朗和突厥学专业？谁给了您最大的学术影响？

茨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这种理想随年龄而不断变化。我读高中时，在理工和语言两科中，我选择了语言，但我对数学和化学更感兴趣。那时，我学习拉丁语和英语，但晚上在“人民中学”学习阿拉伯语，当时我 17 岁。因为化学是我最喜欢的科目，我想从事有关石油的工作，阿拉伯国家盛产石油，所以选择了阿拉伯语。夜校的学习每周一次，在那里，我遇到了老师 Werner Sundermann，他是阿拉伯语学的助教。学了一年之后，我征求他的意见，他对我说：“你已经学了阿拉伯语，现在你可以学波斯语了。”这

收稿日期：2010-05-18

①安藏(?-1293)，畏兀儿人，元代著名翻译家。5 岁即开始学习经典，精通儒家与佛教典籍，19 岁任官朝廷，执掌宗教事务，将许多经典译为回鹘文、蒙文，为发扬回鹘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样,1960 年,我完全放弃了化学,开始到洪堡大学学习波斯语了。

在大学里,教我波斯语的教师是 Bozorg Alavi,他很严格,但很善良。我的主要老师是荣格(Heinrich Junker)教授,他学识渊博,不仅讲授语言学,还讲授历史、哲学、文化、经济结构,以及与亚洲的交流等,知识广泛,令我们感佩。3 年之后,我需要另选一科,正在这时,荣格邀请另外一名匈牙利学者哈蔡(György Hazai)来到洪堡讲授突厥学。

李:原来哈蔡是你的老师,因为你们一起合作撰文,我以为他是你的朋友呢!

茨默:他既是老师,又是朋友。他当时很年轻,来自布达佩斯,为客座教授。我可选的第二科种类很多,别人也给了我许多建议,但我很明确地选了突厥学,因为我对此有兴趣。哈蔡教我们突厥语,他的老师是布达佩斯大学的 Németh Gyula 教授。当他 1963 年来到德国时,学校里只有一些突厥语和乌兹别克语的教师。但哈蔡试图开设突厥学研究课,他通过系统方法,进行教学。他不是讲授广博的知识,而是强调应用,不是为学而学,而是要学生完成研究。他告诉我们,要集中一个目标,然后完成它。同班三、四个同学,有些并未听从哈蔡的建议,但是我遵循了他的教诲。

李:您的导师是哈蔡,我想您直接继承了匈牙利东方学的研究传统,而不是德国东方学传统?

茨默:应该是两者都对我有影响,虽然当时我还没有学习匈牙利语。还需要提及的是我的另一位老师 Wolfgang Steinitz,他是匈牙利乌戈尔语学家,研究乌戈尔民间文学,也关注塔塔尔和乌戈尔语的关系。由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的亲缘关系,他很自然地提倡“吐鲁番学”研究。

李:当您 1965 年成为德国科学院东方所研究生时,德国的突厥语文学研究情况如何?

茨默:自 1902 年至 1914 年,德国先后 4 次向新疆派遣了考察队,在吐鲁番及其周邻地区发掘了上万件以壁画为主的大量艺术珍品,以及数万件用各种语言、文字书写的文书残卷。在勒柯克(Le Coq)的坚持下,这些宝贵文物运往柏林,很快引起对中亚古文化研究有着特殊兴趣的人们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奔赴柏林,进行研究。一门新的学科——以吐鲁番地区命名的奇特学科“吐鲁番学”由此诞生了。

缪勒(Müller)、勒柯克、格伦威德尔(Grünwedel)

是最早开展吐鲁番学研究的学者。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不再到中亚进行考察。战后,邦格(Bang)来到柏林。邦格不仅在吐鲁番学研究中取得巨大成就,而且吸引了来自土耳其、苏联、芬兰、波兰等许多国家的学者追随他学习,之后,他们将德国东方学传到世界各地。在邦格的众多学生中,最著名的是冯加班(Von Gabain),她与邦格合作刊布了《吐鲁番突厥(回鹘)文献》6 大册。她 1941 年发表的《古代突厥语语法》一书,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里程碑。自 1949 年,她任汉堡大学突厥学和佛教学教授。

二战后,吐鲁番文献分割属于不同单位,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1947 年东德科学院东方学所成立,大部分吐鲁番文献归该所管理。1960 年代初柏林墙建成,西德学者无法直接阅读东德藏品。1965 年,在 W. Steinitz 和哈蔡的倡议下,东德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下设立了吐鲁番文献研究组。

我大学毕业后,有两个选择,一为去国家图书馆。我去参加面试,被告知不允许从事学术研究。由于我当时已立志当一名学者,这条件是我不能接受的,我离开图书馆,选择了第二条路,即当研究生(副博士)。我在哈蔡和荣格指导下,学习摩尼文献。在读书研究中,哈蔡给我建议,对我的论文提出参考意见。经过刻苦学习,我通过了非常难的结业考试。但我当时还不是突厥语文学家,我只是追随哈蔡,学习突厥语言学。

问:您学了多少种语言?

我认为我学习的语言还不够。我并不认为学习外语有多么困难,当你掌握了一门外语,以后其他的外语学习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可能是中学时我英语老师教得非常棒,我对学外语有兴趣,之后,学习了阿拉伯语、拉丁语、意大利语、瑞典语、法语、俄语、希腊语、伊朗语、土耳其语、乌兹别克语,还学习了古波斯语、突厥语,以及塞、巴克特里亚、粟特、梵文等中亚语言,但对中亚语言,我所知有限,我应该学习更多语言。学外语需要特殊才能,但这要看是什么样的语言,活的语言要练习发音,需要才能,但如果只是学习单词,一个字一个字地理解其含义,掌握语法,分析句子,这是学者的学习方法,不需要语言天才。

李:您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回鹘文摩尼教徒忏悔词的研究,之后,您写了一系列关于回鹘摩尼文献的论文,在 1969 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吐鲁番回鹘语摩尼教文献的语言文字研究》。如您所知,在您之前,

一些学者,如缪勒、勒柯克、冯加班、斯坦因(Stein)、邦格、沙德尔(Schaeder)、阿斯姆森(Asmussen)以及俄国学者拉德洛夫(Radloff)、马洛夫(Malov)都发表了对回鹘摩尼文献整理和论述的著作,为什么您还选择这一课题作为您研究回鹘文献的突破口?

茨默:在开始学习突厥语时,我只对语言感兴趣,并不知道摩尼教。随着哈蔡和冯加班的吐鲁番学研究,我了解到吐鲁番文献中,与浩如烟海的几乎占90%的佛教文献相比,摩尼教文献数量虽不是很大,但它们却因内容详细而显得特别珍贵,其中最有意义的为《摩尼教徒忏悔词》。所以当哈蔡让我选择题目时,我自然选择了回鹘摩尼文献,哈蔡表示同意,并与我共同讨论。之后,我对摩尼教教义产生兴趣,摩尼教思想深邃,也吸收了佛教的内容。摩尼教流传甚广,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中亚,到蒙古,甚至中国敦煌、泉州,都有传播痕迹。吐鲁番文献为我们认识摩尼教在回鹘人中传播的情况提供了可贵的资料,所以任何一件残片都能向我们提供认识古代回鹘宗教的有用信息,都是弥足珍贵的。

李:在研究生期间,您撰写了关于回鹘摩尼文献及伊索寓言的论文,与哈蔡合作研究《金刚经》一书,同时还撰写书评,并翻译俄文论著,您做这些时遇到哪些困难?是什么信念支持您坚持学习的?

茨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乏图书资料。由于战争,一些国家图书馆的书被移到别的国家,而大学图书馆虽有些书籍,但借阅不便,还有缺页现象。当时不能复印,只能抄,或打印。后来我就把需要阅读的文章照了相,之后自己修正。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比较善于使用工具。如当电脑普及时,我已经老了,但我仍然学会了使用,并从中受益。

我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好老师,哈蔡,他在各方面支持我,鼓励我,坚定我的信心。他可以去西柏林,可以和西方学者交流,这也给我很大帮助。他还给我提供了去匈牙利的机会。能够遇到冯加班,也是我求学生涯中重要的事。她对我帮助很多,寄给我当时很难寻觅的书,如克劳森(Clauson)的《十三世纪前突厥语词源词典》等,我很感动。能够进科学院研究吐鲁番藏品,也是我的幸运,能够看到千姿百态的吐鲁番文献原件,令我感动。我虽然能力有限,但尽了最大努力。

李:经过大学和研究所严格的专业训练,您成为一名杰出的学者。您有什么经验希望对年轻一代谈

吗?

茨默: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因为我更知道我的短处,而不是我的长处。当我回头再看自己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时,我认为自己应该写得更好。

对一个立志治学的青年学生来讲,首先,应该明确自己的兴趣,而不是去问老师自己应该研究什么,因为每个人的兴趣不同,研究方式也不同。另一类学生自以为是,指点江山,肆意批评以前的学者,对在这一领域筚路蓝缕的开创者所经历的艰辛不理解。其实每一代学者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步的,今天我们拥有比前人更好的条件,自然应该取得更大成绩。如果苛求前人,也不利于学术的进步。所以我虽然经历有限,也试图尽可能看得更远。

其次,应该树立一个目标,虽然这个目标有时会发生变化。只有目标明确,才能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

二、治学

李:请谈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成果,您有什么重要的发现?

茨默:当我们说到“发现”时,最大的发现是先驱者的成功,属于勒柯克,我们的发现是微小的。我不是谦虚,这是事实,真正的发明创造并不容易。有些对出土文献的第一次解读,如我最近关于柏孜克里克残片文章,虽然此前学者没注意到,也不能称作发现,新的文字、新的释读,只是好的语文学研究,也不是发现。我只是在提出新的解说方面,比前人有些进步,因为我已在突厥语文学领域研究数十年之久,你写得越多,懂得越多,也更容易发明新的观点。

我的研究集中在中亚出土不同文字的古代突厥文本的释读上。这些释读通常包括对回鹘汗国时代(9至14世纪)3大世界宗教(佛教、摩尼教、景教)主题文本语文学问题的广泛注释,因为在丝绸之路上的吐鲁番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彩的宗教共同体。同时,我还探索了非宗教文献,如文学作品、社会经济文书(包括地契、收获文书、奴隶买卖文书、小麦借贷契约、租佃契约、家庭档案和卖房契,以及与高昌回鹘王国商业、消费有关的文书)等。

1969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吐鲁番古突厥语摩尼教文献的语言学研究》。在论文中,我试图通过对回鹘摩尼文本进行广泛细致的音系学、形态学、形态音系学研究,探索回鹘摩尼文献特色,建立回鹘摩尼文献集成。这本论文未公开出版,但感谢土耳其

学者欧勒麦兹(Mehmet Ölmez)制作了电子文本。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1975年,我出版了《突厥语摩尼教文献》一书,作为柏林藏吐鲁番文献之5。这部书囊括了绝大部分未发表的柏林藏吐鲁番文献,每件都有转写、疏证、德译,并附有图版。之后,2000年,维尔金斯(Jens Wilkens)出版了突厥文摩尼教文献的目录。

1985年出版的《回鹘文佛教头韵诗》(柏林藏吐鲁番文献之13)是我较喜欢的一部著作。阿拉特(Arat)将押头韵的诗歌从散文中分离出来,撰写了重要著作《古代突厥语诗歌》。在此基础上,我很幸运地能进一步搜集更多诗歌,我整理、汇编了长短不同的60种文书,大多数都是韵律著作的新残片,内容属本生故事、颂词、譬喻、题记等,还有一些赞扬回鹘王和回鹘人民的回鹘文赞美诗。

任何种类的佛经可能在回鹘文献中都存在,我主要研究的佛教经典包括数十种比较重要的译自汉文佛经,如《金刚经》、《妙法莲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阿含经》、《华严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大般涅槃经》、《维摩诘经》、《圆觉经》、《父母恩重经》、《佛说十王经》、《玄奘传》等,也研究了译自藏文的密教经典如《陀罗尼》、《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以及回鹘人自己的作品如《普贤行愿赞》及未定名的佛经,译自吐火罗文的《弥勒会见记》等。

我的研究目的在于复原整个回鹘文化。与原本比勘,回鹘文本可能更清晰,更有利于对汉文佛经的理解。当然,回鹘文佛经典可能有翻译错误,但即使是误译,也体现了回鹘文化、哲学思想和文学特点。语言学的训练对文本研究十分重要,但只进行语言学的分析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探索为什么回鹘人这样写,这是第二层次的问题。如一件《千字文》文书,上有回鹘、摩尼两种字母,很明显作者是用回鹘字母翻译《千字文》,而用摩尼字母音译转写,这种安排,颇有旨趣,体现了作者试图区分回鹘文、汉文的努力。

李:吐鲁番学包罗万象,但您几乎穷尽了它的方方面面,从文本看,从宗教文献到世俗文书,您都进行了细致研究;从文献涉及的领域看,由文学到医药,由天文到经济,由饮酒到施主等等,您都逐一探讨;从写本文字看,您研究了用回鹘字母、摩尼字母、叙利亚字母、八思巴字和汉字拼写的文献及碑铭等。此外,您还研究了摩尼教、景教文献,回鹘语诗歌、寓

言、罗摩衍那、五台山赞、五更转、千字文等等。您是如何进行这种百科全书式的研究的?易言之,您是如何扩展研究领域的?您的研究有阶段性吗?

茨默:因为我想阅读整理全部回鹘文献,不止是佛经,而是整个回鹘文献。我只是根据文献资料的内容进行研究,这样才能探索回鹘文化的本来面貌。遗憾的是,有些文献已经丢失了,我们不可能进行全方位、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我虽然进行了广泛探寻,但我还希望更扩展领域,如我现在还对道教的影响感兴趣。转变研究领域、扩展研究范围并非易事,我也有一些论文未能完成。坦率地说,当我看到一份新的文本,我第一次阅读它时总有读“天书”之感,之后,循序渐进地研读,才能判断它的内容。

李:您研读了柏林所有回鹘文藏卷吗?

茨默:还不止柏林的收藏。俄罗斯、英国、法国、瑞典、土耳其、日本及中国北京、乌鲁木齐等地的博物馆、图书馆或其他机构的回鹘文献我也尽量搜集、研读,对此我比较有信心。

李:您从收集支离破碎的资料入手,整理、释读,努力确立准确文本,同时,您还开展关于回鹘姓名学、名称、单词术语、局部特殊词汇、木刻本等系列研究,尽量建立一种科学的方法,试图对以往的局部的、个体研究进行归纳综合和总结,以期展示回鹘王国历史文化的全貌,这是您的目的吗?您从事研究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茨默:柏林吐鲁番研究所的标语是“从吐鲁番考古到吐鲁番考证”。整理文书,不同专业分支因学科性质而不同。我们的工作围绕写本的排比、相关残片的缀合,最终把各种版本纂集起来,最大可能构建著作原貌。柏林吐鲁番文献整理方法的另一特点是集翻译、注释于一体,尽量附有词汇表,以便于其他领域学者检索。对吐鲁番文献的研究,我没意识到我试图建立科学的方法,进行新的分析尝试,我只是从文献的内涵入手,进行理解和阐释,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再进行综合研究,得出有限的假说。

李:请谈一下您将来的研究计划。

茨默:由于精力有限,我不得不缩减我的研究计划。我准备完成我的另一本专著《历史与回鹘文学》,我将追溯各种形式的文学,真正的文学,包括文书、信函,而在我眼里,翻译佛经也是文学。我的第二项计划是研究《十王经》,吐鲁番有回鹘文本、汉文本,一些写本包含图画。我努力根据完整的汉文本,重新

恢复回鹘文全貌。这项工作比较复杂,但又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我们必须先确定碎片与写本的对应关系。地狱审判观念在中亚流传甚广,回鹘文中的地藏王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面貌。此外,我还要与日本学者合作研究净土宗经典等,也计划与其他学者共同研究核定收藏写本。

三、学术活动

李:作为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所长,您在任时做了哪些工作?

茨默:在吐鲁番研究所的团队中,我感到幸福,同事们互相帮助,共同合作研究吐鲁番文献,并与哥廷根大学合作,卓有成效。研究所对吐鲁番文献进行编目,目前所有的藏品目录已接近完成。另一项工作是将文献全部数字化,使所有吐鲁番文献的电子图本能被世界各地研究者使用,这是科学院支持的一个专项课题,始于和阆塞语专家艾默瑞克(Emmerick)任所长之时。

为了普及吐鲁番学知识,我们还编制了一个精美的小册子《吐鲁番研究》,由我负责编辑,全所成员共同讨论撰写。我们几乎商讨了每一个句子,尽量涵盖更多信息,资料可信,介绍准确。它促进了更多人对丝绸之路和吐鲁番学的关注和了解,成为一种新的宣传途径。

李:2002年,您作为组织者之一,主持召开了“重访吐鲁番”国际大会,这次会议被称为一次成功的盛会,您能谈谈召开这次会议的经过吗?

茨默:这次会议的筹备,始于2000年,日本学者百济康义和我提到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纪念丝绸之路文化和艺术研究100年。我与当时的所长宗德曼(Sundermann)商量,由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与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东方部3家在2002年9月8日至14日联合举办了这次国际会议,同时还举行了丝绸之路艺术展。这次大会非常成功,我们得到了政府的资助,我的同事们也精诚合作。来自世界各地的140多位学者莅临会议,宣读论文。会后,用两年的时间,包含72篇论文的会议论文集编辑出版了。

李:您和许多外国学者合作进行了学术研究,您能介绍一下这些合作研究的成果吗?

茨默:是的,我应该提到我的朋友,这很重要,他们给了我许多帮助,我没齿难忘。

由于吐鲁番学的特点,在这个领域,国际合作是非常必要的。我的第一个合作者是前面提到的哈蔡。

1971年,我们合作出版了《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经〉残卷》,为柏林藏吐鲁番文献之1。该书整理、释读、注释了根据汉文托名梁朝傅大士之《颂金经》的回鹘文写本和木刻本。其他《金经》文本最近由雅库甫(Abdurishid Yakup)整理,作为新一卷柏林吐鲁番文献出版。

1976年,我和匈牙利学者卡拉(György Kara)合作刊布了《回鹘文密宗文献译本残卷》(柏林藏吐鲁番文献之7),该书释录注释的是被缪勒称为的“喇嘛教魔法礼仪”,我们确定了其所依经典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和《观世音菩萨秘密如意轮陀罗尼神咒经》等。这也开启了我与卡拉持久的合作。卡拉是匈牙利最伟大的学者,他精通亚洲语言,从蒙古语、藏文到汉文,无一不精。他也非常善良,性情随和。我们经常在一起,甚至一起庆祝新年。我们还合作撰写了《萨迦班智达〈甚深道上师瑜伽〉和〈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的回鹘文译本》(柏林藏吐鲁番文献之8)、《回鹘文度亡书——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本Or. 8212-109所见译自藏文的纳若巴撰〈死亡书〉》等,并一起辨认、整理、刊布了译自汉文伪经《佛顶心大陀罗尼》回鹘文译本。我们将来还有合作计划。

第三个合作伙伴是百济康义。我们的合作开始较晚,始于对《观无量寿经》回鹘文译本来源的研究,之后,我们共同研究,发表了若干篇关于上座部佛教文献《阿含经》的论文,出版了《观无量寿经》的专著,还共同辨识了柏林藏两件回鹘文《玄奘传》未刊残卷。他经常邀请我去日本,后来他得了喉癌,2004年去世。

这些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李:您还和日本学者合编了被学界称为回鹘世俗文献研究丰碑的集大成之作——《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

茨默:我应该提及日本学者山田信夫。1964年,他来到柏林访问冯加班,我得以与之相识,他邀请我去了日本。山田最早开始《集成》的编纂工作。1987年,他突然去世,森安孝夫、小田寿典、梅村坦和我一起继续编辑,我们收录山田的论文,分说明、正文、附录3部分对121件4类(典籍、文书、记录、碑铭)回鹘契约逐一转写、日译、德译,并译注,后附清晰图版。该书于1993年出版,这也是我和日本学者一次愉快的合作。

李:在突厥语文学领域,似乎存在着为学者编辑祝寿论文集的传统,您主编过多少学者的纪念论文集?

茨默:在法国学者哈密顿(J. Hamilton)八十寿辰之际,我和巴赞(Louis Bazin)一起为他编辑了纪念论文集。哈密顿是非常出色的回鹘学研究者,以《五代回鹘史料》、《9至10世纪敦煌回鹘文文献》等知名,我们有着深厚的友谊。令我欣慰的是,这本纪念文集是在他去世前出版的,给了他惊喜。当时我正患有目疾,阅读艰难,又没有助手,而有的稿件转写极难处理。但我克服困难,完成了编纂工作,我还在书中为他写了小传。

我还为百济康义编了一本纪念文集,但那是在他去世3年之后,不能算祝寿文集。

李:您还编辑了耿世民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您是其中的编委之一。

茨默:是的。虽然我不是正式主编,但在民族大学的夜晚,我一次次去和主编商量修改的事,告诉他必须改正某处等等。

四、突厥学与内陆欧亚学

李:请叙述并评价国际突厥语文学研究的现状。

茨默:德国仍然是突厥语文学最发达的中心。在土耳其,有许多出色的突厥语文学学者,但没有充分利用资料,许多人只集中在土耳其历史研究,领域狭窄。而在德国,突厥语文学属东方学范畴,学者研究更加自由。目前,美国呈衰弱之势,英国在发展之中,法国以奥斯曼土耳其研究著名,意大利有少数突厥语研究者,匈牙利的突厥学研究有优良传统,但一度中断,波兰有些学者,捷克更注重土耳其研究。这样看来,日本是突厥学研究的另一个中心。荷兰也有学者从事突厥语文学,但最好能扩展之。

李:您如何评价中国的突厥语文学研究?

茨默:耿世民是开创中国突厥语文学的第一位学者,他在突厥学所有的领域几乎都有涉猎。他是研究新文献的先锋,如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在新疆和甘肃地区发现了很多文献,他以勇气和激情第一个投入其中。他还是石碑文献研究的先驱,也是各国学者之间合作的开创者。他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尽最大努力,取得了成功,令人敬佩。目前,他的学生在世界各地进行着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的一些大学、民族大学、北大、人大、复旦的一些教师和学生加入了内陆欧亚

学研究的行列,这必将推进中国突厥学和内陆欧亚学的进展。

李: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学术环境?请提出一些建议 and 希望。

茨默:现在中国,就做学问而言,有丰富的资料,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有各种合作机会,有普遍的学术交流。在学术会议上,学者能互相争论,讨论批评。年轻的学者能够顺利出国进修,开阔眼界。每天我看电视,都能听到政府鼓励支持教育的声音,国家对学校、对教育重视,使中国的学术环境改进了许多。中国有财力邀请外国学者前来讲学、授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如果与冯加班访华(1982年)时的情形相比,中国的变化令人惊喜。我很喜欢中国目前的学术环境,但感到有合作趋势,但真正的交流还有待加强,图书馆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李:请谈谈世界突厥语文学发展前景。

茨默:没有人能预见将来会如何发展。100多年来,突厥语文学取得了长足进步,我很高兴看到年轻一代的学者已经成长起来。我希望世界各国都有年轻学者投身这一事业,通过各国学者的通力合作,使珍贵的突厥语文献得到充分整理、研究,丰富人类的文化财富。

李:现在有的学者提出要编辑回鹘文的《大藏经》,您认为这个提法可行吗?

茨默:现在,这项工作并不急于进行,我们必须等一段时间。因为还有一些文本没有释读,没有出版,同时,我们还要区分真正的创作和翻译的文本,我们还需要做许多基础性的语文学研究工作,然后,编纂这样的回鹘佛经集成才能可行。但在工作进行中,我们可能又会发现新的文本,使工作再重新开始。新的原始文本的发现,是我的梦想。

李:如您所知,“内陆欧亚”(Eurasia)以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为核心地带,包括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伏尔加河、多瑙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内陆欧亚幅员辽阔,自古以来繁衍生息着无数的民族,创造了千姿百态的文化,这是一个种族、语言、文字、宗教、生产、生活方式千差万别的地区。主要由于游牧民族、特别是所谓骑马游牧民族迁徙、征服、贸易等活动,古代内陆欧亚形形色色的民族及其文化、经济、政治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同样主要由于游牧民族的活动,欧亚草原文化与周邻诸文化(汉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形成

了积极的互动关系，并深深地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份，随着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作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的方式的产生，一个专门的学科——以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特别是中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和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它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为研究对象的内陆欧亚学应运而生。您能谈谈突厥语文学在内陆欧亚学研究中的意义吗？

茨默：即使是提出内陆欧亚概念的塞诺(Denis Sinor)也对突厥人印象深刻。当然，他是从另一角度进行观察、研究。他重视古突厥人的文字，珍视突厥碑铭。从现今的考古发掘看，在早期历史阶段，只有突厥人才有碑铭。因此，突厥语文学在内陆欧亚学中起了重要作用。除碑铭外，还发现了西突厥的资料，货币及其他文书等等。欧亚研究如此广阔，没有人能以一种方式将之全部囊括在内。冯加班曾写过一部关于内陆欧亚的著作。实际上，撰写欧亚历史困难重重，因为许多资料已经失去，许多领域还是空白。但是无论如何，需要发展内陆欧亚学的研究，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学科，许多层面的研究亟待深入。近年内陆欧亚学研究有加强的趋势，如研究不同地区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关系的相似性等。

李：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陆欧亚学研究中心成立，我们除了出版8辑《欧亚学刊》之外，还举办了3次有关古代内陆欧亚学国际会议，并建立了内陆欧亚学网站，还在编辑《欧亚学刊》的英文版和国际版。其中英文版翻译中国学者的优秀论文，国际版发表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月前，国际版已经向您约稿。现在您是内陆欧亚学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对此，您有何感想？

茨默：我对《欧亚学刊》打破中西交流障碍的努力感到振奋。虽然不能把所有文献都拿来翻译，但《学刊》持续不断出版，将会扩大翻译内容，产生重要影响。

我很感激也很荣幸成为内陆欧亚学研究中心的一员，我将向《欧亚学刊》投稿，并尽我的责任。也祝愿内陆欧亚学研究中心取得更大成绩！

李：胜光法师(Küntsün ?ali Tutung)、夔夔(Kki Kki)、安藏(Antsang)等维吾尔族杰出的学者和诗人，精通多种语言，翻译了大量回鹘文经典，为创造辉煌灿烂的回鹘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翻译家中，您最喜欢谁？

茨默：可能安藏是更伟大的学者。安藏在回鹘文和汉文史料中的记载不同，似乎有两种生活。据回鹘文，他撰写了1288颂。

李：安藏是13世纪的高僧，他5岁时从父兄学习经书。9岁始从师力学，一目十行，日记万言，精通儒家及佛教经典。19岁受命于朝廷，后官拜翰林，执掌宗教事务。他除译《华严经》为回鹘文外，还参与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编纂，将《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等译为回鹘文，创作了押头韵的佛教长诗《十种善行赞》和《普贤行愿赞》。从发扬回鹘文化这个角度讲，您可称作“当代的安藏”。您从事的是通过对回鹘文献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阐扬回鹘文化，您最喜欢的城市是中国的吐鲁番，在您的名片上，也印上了“高昌”字样，您对回鹘文化全身心地热爱，也与安藏对佛教信仰虔诚，带着万般仁善从事翻译事业，将之视如生命同出一辙，因此我以“当代的安藏”作为这次访谈的题目。耽误了您的时间，非常感谢！

茨默：谢谢你！也请代我向内陆欧亚学研究中心的同仁致以诚挚的问候！

[责任编辑 孙晋浩]

Morden Antsang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Peter Zieme

LI Jin-xiu